

清末民初白话报刊拟想读者之位移

胡全章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自胡适、周作人按等级分野将清末白话文倡导者对文言、白话的使用区分“我们”与“他们”、“老爷”与“听差”之后,后世史家大体沿用这一说法,并由此形成了对清末二元“白话观”的阶级局限性定位及批判性思维定势。而事实上,清末白话报刊之拟想读者从一开始就并非纯粹的中下民众,部分白话文作者眼光瞄向全体国民。随后,白话报人的眼光逐渐上调,报刊白话文之读者定位逐渐上移,中上社会成为白话报刊不可或缺的接受群体,“他们”和“我们”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界限已不甚分明。至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者将白话打造成现代正式书写语言之候选;而其语言观念、社会基础和白话书写经验,是清末民初 20 余年间逐步培育起来的。

关键词: 清末;白话文运动;白话报刊;拟想读者

中图分类号: G211.9.2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2.018

1922 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将“二十多年以来”提倡“白话报”、“白话书”、“官话字母”、“简字字母”者的历史功绩,限定在“有意的主张白话”而非“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认为其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我们”指向“应该做古文古诗的不妨仍旧吃肉的上等社会”,“他们”指向“应该用白话的不配吃肉只配啃骨头的下等社会”。^{[1](P80)}1932 年,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断言五四新文学家“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清末白话文作者的“态度则是二元的”,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2](P56)}。1935 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再次以阶级分野来指责清末文言、白话并存这一主张是“把社会分作两个阶级,一边是‘我们’士大夫,一边是‘他们’齐氓细民”^{[3](P1)}。自胡适、周作人按等级分野将清末白话文倡导者对文言、白话的使用区分“我们”与“他们”、“老爷”与“听差”之后,后世史家大体沿

用这一说法,并由此形成了对清末二元“白话观”的阶级局限性定位及批判性思维定势。

然而,历史真相恐怕并非如此简单。那么,清末白话文作者之采用“白话”,究竟是单纯为“他们”而丝毫不考虑“我们”?还是既为“他们”亦为“我们”?抑或是刚开始主要为“他们”,后来亦兼顾了“我们”?清末民初 20 余年间,“他们”与“我们”是否一成不变?本文拟通过对清末民初报刊白话文之拟想读者的考察分析,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探讨。

一、“尽天下之民而智之”

早期启蒙白话报的拟想读者,毫无疑问是识字不多的中下层民众和妇女儿童,然而其实际受众却并非如启蒙先驱者所预料的那样,下流社会订报者不仅不占多数,甚至可以说微乎其微。清末民初,随着新式学堂的推广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普通民众的文化素养在不断提高,白话报人也

收稿日期:2015-12-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清末白话文运动研究”(项目编号:11YJA751021)。

作者简介:胡全章(1969-),男,河南鹿邑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

根据时代需要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读者定位。清末白话报刊之读者定位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变化与调整,既影响到报刊白话文的内容质量及其启蒙效果,也促使报刊白话文之语言与文体逐渐朝着近代化与规范化方向发展。

1898年8月,清末白话文运动急先锋裘廷梁在其名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言:“谋国大计,要当尽天下之民而智之。”^[4]“尽天下之民而智之”,是维新派的教育理想和启蒙目标。自那时起,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批先觉者,就不再仅仅将目光瞄准高居上位的当国者,而是径直走向学校、报馆和广场,走近普通民众,广开民智,“为中人以下者说法则”^[5]。“为中人以下者说法则”,最早是《京话报》于1901年打出的招牌词,此后迅速成为白话报界颇为流行的一句口头禅。这句时代流行语,清晰地标明了清末白话报人眼光向下的启蒙意向。直到清宣统三年,白话报界仍然坚信:“地方报之两大天职,厥惟开通民智,改良社会。而所谓开通改良者,决非仅求一部分之有效而自足,必以大多数人民咸受炉冶为归。”^[6]其所秉承的,依然是白话报先驱所定“尽天下之民而智之”的信条。民国初肇,文话报和白话报依然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各自预设的读者群体,“文话报,多销于上等官僚,学堂局所;白话,是普遍中下社会,妇孺孩童”^[7]。

然而,清末白话报刊之实际受众却并非尽是“中下社会”和“妇孺孩童”。实际上,下等社会中人绝大多数并不具备购报和阅报的能力,其真正的阅读对象以中等以上知识者为主体。启蒙对象与实际受众之间这一明显差距,令许多白话报馆纷纷调整自己的读者定位。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为中下社会说法,而将眼光投向全体国民。1901年创刊的《京话报》虽然确定了“为中人以下者说法则”的办刊导向,然而其拟想读者不仅涵盖了全体中国国民——声称“就是南方的上中下三等人,皆也不可不看这报”——甚至兼及“在中国传教的洋人以及各国钦差衙门领事衙门的翻译官,各省海关上的洋员,各处的洋商”;其实际受众还包括外国设立的中文学堂学生——“日本一处学中国话的就有数百人,每人都要看一份这个报的”。^[8]坚持“为中人以下者说法则”,却又自觉地调整着其读者定位,《京话报》的现实处境颇具代表性。

更具代表性的是热心白话事业的《大公报》主人英敛之及其领导的白话文写作班子。英敛之不仅在《大公报》创刊伊始就辟出专刊白话的“附件”栏目,而且很快就将其拟想读者从一般白话报定位的“中人以下者”调整到兼顾“上等人”。1904年初,《大公报》同仁注意到:“本报后边的一段白话,虽然说是为不通学问的人作的,到底不认得字的人,仍然是不懂得,还得认字的念给大家听。故此这白话,也是常常对着上等人说法的时候多。”^[9]其所谓“上等人”,自然是指“通学问”、“认字”的知识阶层。在“文话”属于“上等人”专利的年代,白话为“上等人”所不屑;然而为了让其充当“念给大家听”的中介,作为权宜之计,故而《大公报》白话附栏“也是常常对着上等人说法的时候多”。在英敛之看来,“顶好是对于中等社会用白话”;“要是求下等的社会开化”,顶好的办法“是通行新字”。^[10]可见,《大公报》白话附栏及《敝帚千金》附张的读者定位,实际上以“中等社会”为主体,兼及“上等人”和“下等的社会”。

无独有偶,清末最富盛名的南方白话报刊——《中国白话报》——的实际读者定位,亦颇耐人寻味。1904年5月,该报针对读者来信指责其文义太深辩解道:“报馆本有监督国民的责任,这国民的范围大得狠(很)。孩童妇女固然在国民之内,那党派学生何尝不是国民?而且现在识字的人太少,我这报并不是一直做给那般识粗字的妇女们孩子们看的,我还是做给那种比妇女孩子知识稍高的人看,教他看了开通之后,转说把妇女孩子们看,这叫做间接的教育,所以说话不免高些。”^[11]这一辩解与《大公报》同人的说法可谓不谋而合。由此可见,该报真实的读者定位并非发刊词中所言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而是那些比他们“知识稍高”、可以使他们接受“间接的教育”的中等知识者。该报刊登在《警钟日报》的一则广告,亦可窥知其实际受众:“本报陈说虽浅,立义则高。若非藉同志之媒介得以间接力以及于一般国民之耳目,则恐吾言之徒劳矣。”^[12]原来,其实际读者并非识字无多的“一般国民”,而是知识阶层、尤其是革命“同志”。

清末京津地区最富盛名的白话报《京话日报》所标榜的宗旨,是“开通内地的风气,叫人人都知

道天下的大势”,其拟想读者并非全是中下社会,而是全体国民;“我这报上,也有上谕,也有戏单子”,此番宣传,显然是为了招揽中上阶层读者^[13]。彭翼仲随后所标榜的“叫人人知道爱国,人人知道发愤图强”^[14],更是面向全体国民言说。1907年创办的《官话北京时报》,不仅考虑到“一律官话,以便京外通行”,将拟想读者由北京地区扩大至全国,而且将“留心时事之士庶绅商”均纳入阅读期待视野^[15]。“士”和“绅”显然并非下层社会中人。继《京话日报》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白话日报《正宗爱国报》刊载的一则消息,道出了清末京津白话报刊之实际受众的真实情况:“白话报,上等人看的极多,下等人看的也不少。”^[16]据《京话日报》行世时的见证人和受益者梁漱溟回忆,该报“原是给一般市民看的,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亦不少”^[17]。梁先生此言,证实了《正宗爱国报》记者报道的关于白话报“上等人看的极多”的新闻所言不虚。清宣统三年旧历岁末,《北京新报》尤自诩“体裁明显,有益人心,识字多的看了不厌,识字少的看了明白,则不能不推《北京新报》为第一了”^[18]。可见,清末民初白话报人不仅考虑到让“识字少的看了明白”,而且留意到让“识字多的看了不厌”这一层面的问题。

同时期存世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白话报刊,其拟想读者也兼顾到了全体国民。1906年问世的《竞业旬报》,将宗旨定位在“对于我们四万万同胞,干些有益的事业”,使国人“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大家齐来,造一个完完全全的祖国”。^[19]1908年7月创办的《国民白话报》,在其问世所遭遇的实际受众与拟想读者之间存在重大错位的尴尬情形,是印证白话报“上等人看的极多”这一真实历史境况的典型事例。1908年7月,以“开通不能进学堂、不能看书报的多数国民”为宗旨的《国民白话报》创刊后,“在各大埠组织分馆或代派处,雇人拿到大街小巷去零卖。心想多卖一张,就多开通了一个人。出版以来,两个月了,调查调查各处的情形,那知道定长看的居十之八九,零卖的很少。中上社会定看的,十之九;下等社会定看的,简直就算没有”;这一尴尬现状,令志在开通下等社会风气的《国民白话报》同人很是沮丧,深感“创办这报的目的,总是未达”。^[20]然而,报馆同人也不得不正视读者接受的实际情况,遂

决定将报纸更名为《安徽白话报》,宗旨表述为“开通风气,使人人得有普通之知识”^[21],不再着重强调开通“不能进学堂、不能看书报”的底层民众。这一貌似不经意的细微的措辞变化,反映出该报读者定位的微妙变化与调整。他们调整了较为激进同时也较为偏狭的办刊方针,回归到裘廷梁标举的“尽天下之民而智之”的信条上来,立足安徽本省,将其拟想读者定位在全体国民而非下等社会。《安徽白话报》的第二、三条宗旨是:“调查各州县政教风俗之新闻及旅居各省各团体之新闻,使在籍在外之皖人得联声气”;“对于教育普及、地方自治、路矿三大问题极力倡导”。^[21]其拟想读者,更是非中上社会中人莫属。

清末白话报刊的读者群涵盖了各个阶层,尤以开明官僚、士绅、商人、教师和学生为多。以《杭州白话报》为例,在山西省大力推销该报的是开明官绅,在嘉兴热心买报分送的是广智学会成员,在杭州设立分送白话报社的是求是书院和武备学堂的有志青年。旨在开通下层劳动阶级之智识的《中国白话报》,其实际受众和热心传播者则“尤以学生社会为多数”^[22]。属于革命派阵营的《童子世界》、《安徽俗话报》、《竞业旬报》等白话报刊,其拟想读者的情形亦大体如此。至于章太炎等主持的《教育今语杂志》,则将“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放在其宗旨的第一位,其次才是“提倡平民普及教育”^[23]。其读者定位,主要是留日学生与南洋华侨,大体属于中上社会中人。

清末民初二十余年之中,随着报刊杂志和出版业的发展,教育的推广,社会风气的转变,普通国民的文化素养在不断提高;“何况当初瞧文话报的人,因为生计艰难,改为瞧白话报的,所在皆是”^[24]。由于“看白话报的诸君,知识日进,眼力增高”^[25],读者对白话报人的办刊水准和白话文作者的写作水平,自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13年,《群强报》读者平敏对民初北京白话报界“有越做越土的,有越做越俗的”,从而导致“价值太低”的状况痛下针砭;^[7]这则耐人寻味的真实材料,从读者阅读期待视域反证了有识之士对白话报刊之正大宗旨和白话书写之雅俗共享境界的体认。

事实上,随着社会日见进化,清末民初白话报刊读者眼光日高,白话报和白话文的内容、风格、语言、文体等方面确在发生着变化。民元前后报刊

白话书写不约而同出现的“文话”化和书面化趋向,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也可以从白话报刊拟想读者的定位逐渐提高的角度来解释。至五四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之主阵地,更是将拟想读者定位在青年学生和社会精英,取得了更大的社会嗣响。

二、由启蒙心态到自我言说

20世纪初年,文言为雅、白话为俗的观念尚未真正打破,启蒙先驱者的白话文写作的确主要针对中下社会普通民众,而士大夫阶层乃至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群体为诗作文,用的仍然是文言。白话尚不足以替代文言,承担起所有表达功能。胡适言晚清白话文作者之致命缺陷是思想观念上仍然存在着“我们”与“他们”的分别,两者泾渭分明,乃至壁垒森严——这一断言并非空穴来风,可说是道出了相当一部分历史真相,但也不无以偏概全之嫌。诚然,早期白话报人写作白话文主要对“他们”宣讲,思想观念上的确存在着“我们”、“他们”的分别,但其白话文写作也并非完全不考虑“我们”。随后,白话报人的眼光逐渐上调,清末民初的白话出现了逐渐向中等社会乃至上等社会移动的历史趋向,中上社会已成为白话报刊不可或缺的接受群体,“他们”和“我们”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间的界限已很难截然分开。

早在1901年,黄秀伯创办的《京话报》就兼顾到“上中下三等人”,兼及“在中国传教的洋人以及各国钦差衙门领事衙门的翻译官,各省海关上的洋员,各处的洋商”。^[26]作为知识阶层的“我们”,自然包括在内。1902年,《杭州白话报》主笔锋郎那篇饱蘸血泪的《中国人最羞辱最悲愤的纪念碑》一文,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口吻,讲述在日本大阪博览会上人类馆、台湾馆和风俗馆中的见闻,对日本政府将中国与印度、安南、朝鲜列为同类野蛮人以及“明是把台湾的人,做我中国人的代表”之作法,将小脚、鸦片烟具、骨牌骰子、枷锁香烛等“不堪入目、貽笑万国”的器具视为中国风俗之代表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悲愤。^[27]这篇“哭告我有荣誉有血性的中国国民”的文章,其拟想读者,显然没有“我们”与“他们”之分。

在早期报刊白话文中,此类情况不在少数。以1904年《安徽俗话报》为例,其所刊载的许多白话

文,叙述人都是对着全体国民言说;提及中国,必是“我们中国”;发抒自己的见解,时时有“我”字出现。化名“三爱”的陈独秀在《瓜分中国》一文中描述庚子国难后列强“瓜分中国”的情景道:“因此各国驻扎北京的钦差私下商议起来,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传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国’。”^[28]谈论《安徽的矿务》,开口“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我们安徽人”,闭口“我们是断断不依的”;^[28]与之相对应的“他们”,则是贪官污吏、卖国贼之流。讲述《中国历代的大事》,则站在“中国人”的民族立场乃至“我们汉人”的狭隘的种族立场上。^[29]其《说国家》一文,则从“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说起,进而反思“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30]不难看出,其叙述人是第一人称,拟想读者则是全体国民。它如《恶俗篇》、《亡国篇》、《国语教育》诸篇,其叙述人要皆站在全体国民立场言说,为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前途着想。再如飭武谈《整顿蒙学馆的法子》,开口“我们从前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中国”;^[28]铁郎讲“保养身体的法子”,更是以中国国民一分子自居,对着全体国民说话。

随着“看白话报的诸君,知识日进,眼力增高”^[25],白话报刊主笔的读者定位也随之不断调高。“上等人也教他爱看,中下人也懂得”^[31],《群强报》热心读者平敏此番见解,大体反映出了民元前后京津白话报刊的实际读者定位情况。“他们”与“我们”的界限渐趋模糊,殊难将其截然分开。

不仅如此,一些白话文的叙述口吻已经有意无意地摆脱了启蒙心态和“说教”意味,有点接近作者叙述人的自我言说。杨曼青《说菊》一文写道:

尝见今人爱菊,藉着陶渊明为口实。殊不知晋代陶公,满怀是忧时利物之心。不得已归隐故里,以爱菊作为寄托,也似楚国屈子咏赋《离骚》,以美人香草寓意,略舒满腔的忧愤。到了晋时,陶老先生名位与屈子虽不同,那一种忧时的心,我想是一样罢。后人但知渊明爱菊,真冤苦了陶公。陶公生在那等时代,还能一味的傻爱菊,那还够的上五柳先生身分吗?^[32]

其所谓“今人”、“后人”,当然是一种泛指,但能够对“陶渊明爱菊”有所了解的“今人”,恐怕不是目不识丁的愚夫愚妇、贩夫走卒。其拟想读者,

大体属于与作者身份差不多的受过教育的读书人。其叙述口吻,基本上是作者叙述人的自我言说。自然,作者的识见比当时一般凡夫俗子高明一些,其对五柳先生的“忧时利物之心”,有着深切的“了解之同情”。

这一状况延续到了民初。我们看民国二年《爱国白话报》所刊《说根柢》一文之开篇:

静坐无聊,闲在园中散步。见有一大棵松树,长得参天蔽日,枝若虬龙。那一把大伞似的松枝,足可以广荫十亩。又见那阶前砌下,一丛一丛的闲花细草,红的真红,绿的真绿,青葱紫蕊,亦觉着很是可爱。鄙人伫立园中,正自呆看,忽然间风自天来,声吼如虎。那一遍闲花细草,立时就颓萎不堪了。回看那大棵松树,依然是苍苍翠翠,稳而无恙。^[33]

这篇说理议论文,先从作者亲身经历的一次对自然界的观察体验着笔,再引起下文的立论。从其叙述姿态和拟想读者来看,均不存在“我们”、“他们”之分。

类似的例子在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中不胜枚举,民初更为明显。且看1914年《白话捷报》主笔文洽贤一段说理演说文:

记者昨天起得很早。起来之后,就在院中散步,看见轻烟淡淡,晓雾蒙蒙,一竿红日,光线刚刚射到地面。院中的草木,才发生了一些嫩绿的萌芽。枝上的花蕊,才带了一些浅红的颜色。景色异常清幽,庭院颇觉清静。记者往来徘徊,吸收了一些新空气,脑筋中忽然一活泼,心思忽然一动,想起了几句书来。记得邵康节先生曾说过几句话,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我想我今天起的很早,恰恰的正是是一个清晨,现时是阳历三月,阴历的二月,又恰恰的是一个春天。当此清明之气,鼓动精神的时节,断不可不思忖一生的打算。于是我自己就反复盘算起来,盘算了半天,细想我半生潦倒,困顿风尘,到如今已三十,不过每日里拿着一支毛锥子,向文字中求生活,那不是误在一个懒字上了?^[34]

作者以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生活阅历现身说法,字里行间流露出心酸的人生经历和穷困潦倒的现实境遇。虽然该文的立意和重心仍不脱“劝人”窠臼,却既无居高临下的高傲姿态,又无痕迹明显的说教口吻;文笔生动,且不乏欣赏轻烟、晓雾、红日、草木、花蕊乃至清幽环境和新鲜空气的闲情逸致与审美欲求。此刻,“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他们”并非什么“听差”,“我们”亦非什么“老爷”,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综而观之,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主笔的叙述立场,对全体国民言说者占多数。从其实际受众来看,彼时的白话报读者不通文字的下层人极少(他们至多不过充当讲报员的听众而非白话报的直接读者),粗解文字但通文不深的中层人士居多,且通晓文字的“上等人看的极多”。何况,20余年中,随着白话报刊读者群体知识日进,眼界日高,白话报刊主笔的读者定位也随之不断调高,其阶级或等级分野实不能一概而论,报刊白话语言的雅化、近代化与书面化成为演变发展之大势,“他们”与“我们”的界限已不甚分明。

清末报刊白话文之拟想读者从一开始就并非纯粹的中下民众,部分白话文作者从一开始就将眼光瞄向全体国民。随着白话文运动在多个领域的次第展开,人们的语言观念在改变,白话书写的表现力也在不断提高,白话文学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更是盛况空前。清末白话文作者和读者群体均存在逐渐向“中等社会”乃至“上等社会”位移和渗透的现象。这一历史动向,为受过新式教育、具有新知识和新视野的嗅觉灵敏的时代先觉者所窥知。而新一代知识分子一旦占据了有利的文化位置,掌握了优势的文化话语权,就利用这一权力进一步提高白话的社会文化地位,乃至使其升堂入室,将其打造成现代正式书写语言之候选人。这就是五四一代知识精英们发起的新一轮白话文运动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之一。而其语言观念、社会基础和白话书写经验,是清末民初20余年间逐步培育起来的。

参 考 文 献

- [1] 胡适.五十年以来中国之文学[M].上海:申报馆,1924.
- [2]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 [3]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 [4]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J].中国官音白话报,1898,(19).
- [5] 创办京话报章程[J].京话报,1901,(1).
- [6] 本报易名宣言书[J].虞阳白话报,1911,(39).
- [7] 平敏.论白话报不可太无价值[N].群强报,1913-03-25.
- [8] 论创办京话报的缘故[J].京话报,1901,(1).
- [9] 文明野蛮全在有无教育[N].大公报,1904-02-25.
- [10] 开通民智的三要策[N].大公报,1904-03-06.
- [11] 答常州恨无实学者来函[J].中国白话报,1904,(11).
- [12] 中国白话报广告[N].警钟日报,1904-04-05.
- [13] 作京话日报的意思[N].京话日报,1904-08-16.
- [14] 本报忽遇知己(续昨稿)[N].京话日报,1904-10-30.
- [15] 官话北京时报出版广告[N].大公报,1907-12-08.
- [16] 本京新闻·如是我闻[N].正宗爱国报,1908-03-15.
- [17]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18] 朱芷沅.祝北京新报三周年词[N].北京新报,1912-02-18.
- [19] 本报之大纪念[J].竞业旬报,1908,(29).
- [20] 本馆紧要广告[N].国民白话日报,1908-09-24.
- [21] 安徽白话报广告[N].国民白话日报,1908-09-24.
- [22] 敬告阅报诸君[J].中国白话报,1904,(8).
- [23] 教育今语杂志章程[J].教育今语杂志,1910,(1).
- [24] 诤诤声.报无大小之分[N].爱国白话报,1913-11-18.
- [25] 杨曼青.白话报[N].群强报,1913-07-06.
- [26] 论创办京话报的缘故[J].京话报,1901,(1).
- [27] 锋郎.中国人最羞辱最悲愤的纪念碑[J].杭州白话报,1902,(16).
- [28] 陈独秀.瓜分中国[J].安徽俗话报,1904,(1).
- [29] 陈独秀.中国历代的大事[J].安徽俗话报,1904,(3).
- [30] 陈独秀.说国家[J].安徽俗话报,1904,(5).
- [31] 平敏.论白话报不可太无价值(续昨)[N].群强报,1913-03-26.
- [32] 杨曼青.说菊[N].北京新报,1910-09-21.
- [33] 懒.说根底[N].爱国白话报,1914-02-10.
- [34] 泪墨生.勤[N].白话捷报,1914-03-20.

Shift of the Assumed Readership of Vernacular-based Press in Late-Qing and Early Republic Age

HU Quan-zh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late Qing Dynasty, Hu Shi and Zhou Zuoren distinguished "we" from "they" and "master" from "servant" according to the hierarchy embodied in language use, i.e., users of classical and vernacular Chinese. Since then, historians followed the division and shaped a dichotomy of class in language use and related critical thinking. However,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vernacula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age never targeted their readership at middle and lower class only, some vernacular writers even clearly targeted their readership at citizens of all levels. After that, the vernacular press practitioners focused more and more on issues of higher level, and their assumed readership was adjusted gradually to higher class. As the middle and higher society became indispensable receptive group,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y" and "we" was blurred.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the expounders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proposed vernacular as candidate for formal modern written language. The basis for such a proposal was based on the linguistic ideas, social basis and vernacular writing experiences which were developed in the some two-decade period.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vernacular language movement; vernacular press; assumed readership

(责任编辑:刘伙根 庄暨军)